

许慎与「说文」小丛书 主编 王宁 董希谦
董希谦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说文解字』

一夕谈

许慎与「说文」小丛书 主编 王宁 董希谦
董希谦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说文解字』

一夕谈

(豫)新登字 01 号

许慎与《说文》小丛书

主编 王宁 董希谦

《说文解字》一夕谈

董希谦 著 责任编辑 魏亚洲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卫生厅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875 字数 49000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ISBN7-215-03079-2/H·113 定价:2.50 元

序

王 宇

许慎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文字学家。一千八百多年前，他编著的《说文解字》，在中国文字学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且有着长盛不衰的影响。

有人把《说文解字》称作一部字典。其实，它的意义和作用岂止是一部字典！它不仅为我们系统地贮存了经过秦代书同文规范了的小篆和一部分曾与小篆有密切关系的大篆和“古文”，贮存了经先秦经典验证过的古代文献词义；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对上万个汉字的形体逐个地分析，证实了早期汉字因义构形的特点，确立了以形索义的词义分析方法；它通过独创的体例，总结出小篆构形的总体规律，描写出小篆构形的完整系统，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如络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由它所显示的小篆构形系统，由于顺应汉字的发展趋势，又由于切合汉字的实际，还因为符合汉字优化的原则，所以，强有力地影响了后代的隶书和楷书，起到了促进汉字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在解释汉字的形义上一直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王 宇

一千八百多年来,《说文解字》以一部书创出了一个“学”,人们称作“说文字”或“许学”。特别是清代以来,说文学的大家辈出,巨著不绝,生发出《说文》体例学、汉字构形学、汉字形义学、汉字字用学和汉字文化学等分支,为汉字基础理论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近代以来,比篆文更早的出土古文字丰富了汉字历史的研究和汉字字源的探讨,使人们进一步明白了《说文解字》的伟大意义,也客观地看到了它的局限性。对《说文解字》的认识更加深入了,应用也更加广泛,普及说文学知识成为更多人的要求。

许慎是河南鄢城(现属漯河市)人,河南是许慎的故乡,河南人民崇敬地称许慎为“字圣”,他们说,河南有“四圣”:字圣许慎,医圣张仲景,画圣吴道子,诗圣杜甫。这些话里,包含着河南人民对中原文化的自豪。和世界同时期的语言文字专门著作相比,象《说文解字》这样构思严密、分析透辟、有明确理论指导又具有创新体例、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历史作用的字料、语料汇集,确实不多见,在这个意义上,说许慎是“字圣”是不过分的。

河南人民出版社和《许慎与〈说文〉小丛书》的作者们,就是基于上述原因,出于深入浅出地介绍《说文解字》方方面面的愿望,把这套小丛书奉献给对汉字的使用和研究有兴趣的读者以及热爱故乡、崇敬许慎的河南人民的。应当说,我

们的工作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之处,但我们相信,读者和我们是相互理解的,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说文解字》和汉字问题的研究和普及工作,一定会越作越好,并且将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汉字规范、汉字信息处理以及弘扬祖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了解我们祖国的历史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

一九九一年八月

目 录

一、《说文解字》的诞生·····	(3)
二、许慎的“六书”说·····	(11)
三、《说文解字》的编排·····	(28)
四、《说文解字》的价值·····	(42)
五、“《说文》学”的研究历史·····	(60)
六、当代《说文解字》研究概况·····	(72)

许慎是我国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和文字学家，他以毕生的精力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分析字形、探究字原、辨识声读的文字学专书《说文解字》，也是世界字典史上最早的一部大字典。这部字书首创了汉字字典的编纂体例，集汉代以前文字、音韵、训诂之大成，整理并保存了篆文字系，成为通晓秦汉以前语言文字的阶梯和桥梁，奠定了汉字学的理论基础、为汉民族的发展和汉字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国内尊许慎为“字圣”，称《说文解字》为汉字经典，称许慎与《说文解字》的专科研究为“许学”或“《说文》学”。目前“许学”已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国外的汉学家都很重视《说文解字》的研究，把它当成学习中国文化的管钥。随着汉字文化的发展，《说文解字》在世界文化史上越来越显示出重要的作用。

《说文解字》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正如许冲《上〈说文解

字》表》所说，“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可见《说文》内容之丰富与翔实，可以从不同方面去研究。作为先秦两汉的字书，体例又最完善，对语文学习者来说，是根柢之学。通过字词形音义的研究，不仅了解汉字的历史，懂得一点一画的所以然，使字形字义深入人心；而且可以有效地纠正错别字，促进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从而促使建立科学系统的汉字学。

为了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对于这么一部在文化学术史上占有崇高地位的专著，我们有必要下一番功夫去学习，这里将对有关《说文解字》产生的历史条件，内容和体例，价值和意义，成就和影响，作一个简要的介绍。也可以说就《说文解字》的问题与读者作一夕之谈。

一、《说文解字》的诞生

这里首先简单介绍一下《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字叔重，东汉汝南郡召陵县万岁里（今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县许庄村）人。大约生于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 58 年），担任过汝南郡功曹，举孝廉后，入京师任太尉府南阁祭酒，曾在东观校书。约在安帝元初年间委任沛郡洨（今安徽固镇东）长，未就职称病归故里。许慎的卒年有两种说法：一说卒于桓帝建和元年（公元 147 年），一说卒于安帝之末（公元 125 年），《汉书·儒林传》只说“卒于家”。在和帝永元八年（公元 96 年），贾逵任侍中骑都尉时，许慎从师于贾逵，精通古代典籍，当时人们称赞他“五经无双许叔重”。他“博采通人”，“遵修旧文”，于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 100 年）开始编纂《说文解字》，历时 21 年，直到建光元年（公元 121 年）才告完成，派遣儿子许冲把写定的《说文解字》上奏朝廷。这才有了中国第一部字典。后人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称他为“许祭酒”、“南阁祭酒”，或称“洨长”、“许君”，而不直称其名。后人长期尊称他为“许圣人”和“字圣”。

《说文解字》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有明确理论指导的汉字专

书,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切伟大著作一样,它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时代的产物,是那个时代文化和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说文解字》产生在中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时期——汉代。早在汉代以前的春秋时期(公元前 770——前 476 年)和战国时期(公元前 475—前 221 年),我国历史上出现过百家争鸣、欣欣向荣的局面。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文化上又要求“书同文”,用比较简便的小篆和隶书统一文字,这对以后文化和学术的发展有极深远的意义。但秦王朝同时也采取了愚民和禁锢文化的政策,大规模的焚书坑儒,毁灭经书旧典,严禁私人藏书,使文化和学术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公元前 206 年,汉高祖刘邦建立了西汉政权,他总结了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一方面宣布废除秦代苛政,颁布较秦法缓和的九章律;另一方面征召天下的“贤士大夫”到京师,授予官职以充实各级政权。特别是东汉光武帝刘秀还注意从儒生中察举孝廉,收揽大量的统治人才,加强了政权的政治基础。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废除更役制度,遣散军吏还乡生产,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又兴修水利,治理黄河,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使市场货物充足,物价低廉,出现了社会稳定的局面。

两汉统治者在注重发展生产的同时,也重视科学文化的

发展。在国都建立太学，设置博士，讲授五经。设立国家图书馆，广泛搜求整理图书。还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进行学术研究，由此造就了史学家司马迁、班固，文学家贾谊、枚乘、司马相如，语言文字学家许慎、郑玄，医学家张仲景和科学家张衡等。如果不是汉代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社会生产长足的发展，就不可能造就这么多的人才，出现《史记》、《汉书》、《说文解字》、《方言》、《释名》等这样伟大的历史、文学、语言学巨著。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就不可能出现《伤寒论》和《神农本草经》这样的医学名著，也不可能出现浑天仪和地动仪等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成就。总之，这一时期多方面的成就，对中国和世界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教育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汉宣帝时征召张敞、杜业、爰礼、秦近讲授古文，读本用古字写就，如《仓颉》、《爰历》、《博学》等字书。到了汉平帝时，又征集天下各路文人到京师讲学，其中在未央宫中说讲文字的就有百余人。许慎生活在这个时代，社会教育迫切要有规范的字典，迫切要有严格的书体制度，而由于古文字的方块隶化，西汉今文经学派的泛滥，加之东汉王室的衰微，当局没有力量注意各种书体文字的统一，政府官员不大懂得“六书”的基本原理，又不按规定考核“讽籀书九千字”，古文学派的许慎不能容忍这种混乱状况，也就激发他编纂《说文解字》这部著作，使文字在教学规范上有所依据。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汉武帝时就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确立了儒家在思想领域里的统治地位。东汉光武中兴,弘扬儒学,会见博士。汉明帝亲自讲授五经章句,汉章帝建初四年,诸儒聚会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这样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经学和依附于经学的语言文字学就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文化学术的复兴和发展,要求书写规范和统一,要求有一部收字齐全,形、音、义、综合考辨而又编排科学系统的字典。这是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汉代经学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秦焚书后,经籍毁灭殆尽,汉代搜求旧籍,依靠口耳相传,汉人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下来,官方博士讲授儒家经学都是用这种传本。如晁错记录秦博士伏生口授《尚书》,汉代始著于竹帛的《春秋公羊传》,这些被称为今文经。汉武帝末年鲁恭王从孔子旧宅的墙壁里发掘一部分儒家经典《尚书》、《春秋》、《礼记》、《论语》、《孝经》,这些都是用先秦东方六国文字写成的。还有北平侯张仓献的《春秋左氏传》,河间献王所得古先秦旧书《周官》、《孟子》、《老子》,鲁三老所献的《古孝经》等,这些都被称为古文经。“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不只是文字书写方式和传本的不同,而是由于研究者目的、研究方法以至对经书内容理解等一系列问题上有分歧,而且随着师承传授源流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政治观念和歷史观念,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派。汉代儒

生研究古文经的称为古文学派，研究今文经的称为今文学派。这两大流派互相攻讦，各行其是，斗争很激烈。西汉时今文学派占统治地位，五经皆列于学官，古文学派只在民间私相传授。到了东汉中叶，古文学派压倒今文学派，达到全盛时期，许慎师承古文学家贾逵，站在古文学派一边，他的《五经异文》就是为捍卫古文学派而作，赢得了“五经无双许叔重”的赞誉。

经籍的政治思想极为鲜明，古今文经学论争的核心在于还经籍以本来面目，并正确阐发经义。表现在文字方面，今文学派仅据隶书形体说解文字，不能追溯造字之原，申明造字本义。他们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便辞巧说，破坏文字形体，任意说解经义，又片面强调秦之隶书为古帝所作，父子相传，不可改易。他们望文生训，以至闹出了“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的笑话。古文学家如张敞、贾逵、许慎等懂得“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为阐明经义服务王政，古文学派十分重视语言文字的训诂，据古文字形分析造字初义，许慎作《说文解字》，正是要驳正今文学家的“巧辞邪说”，很明显他是以语言文字的规范为主要目的。由于古文学派是以文字、声韵、训诂作为解经基础的学派，他们的研究成果为《说文解字》成书提供了条件。许冲在《上〈说文解字〉表》中说得很明白：“臣父故太尉南阁祭酒慎本从逵受古学。盖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今五经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义。恐

巧说邪辞使学者疑，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由此可以说《说文解字》是古文经学派战胜今文经学派所建立的一座丰碑。范文澜先生在他的《中国通史》中说：“这部巨著集西周以来文字之大成，也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对不懂文字形义，依据隶书穿凿附会的今文经学说来是一个严厉的驳斥。《说文解字》的编成正显示古文经学有坚实的基础，有力量驳斥今文经学。”

上面我们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学术动态诸方面了解到了《说文解字》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原因。下面进一步看一看许慎在继承前代字书基础上，充分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而后写出这部内容最丰富最完整超越前人的不朽巨著《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以前早期的字书现在无法看到，据《汉书·艺文志》所列和前人引述，主要有下面几种：

《史籀篇》，周宣王太史作，史官教学童的书。

《仓颉篇》，传为秦李斯作。

《爰历篇》，传为秦赵高作。

《博学篇》，传为秦胡毋敬作。

许慎《说文解字》所引籀文，来源于《史籀篇》。后来秦统一天下“书同文字”，《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都取用史籀大篆的字体，有的作了一些简化和改动，就成为小篆。

《凡将篇》，汉司马相如作。

《急就篇》，汉史游作。

《元尚篇》，汉李长作。

《训纂篇》，汉杨雄作。

《仓颉训诂》，汉杜林作。

中国字书的产生，探溯渊源，最早的是周宣王太史作的《史籀篇》，近人王国维认为所写的是周秦间西土文字。《史籀》的成书不会晚于战国初期。继此而作者，《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都是秦统一文字后，用来作为小篆字体的范本。汉代把这三部书合而为一，统称《苍颉篇》，后杨雄续《仓颉篇》而撰《训纂》。汉人摹仿《史籀篇》、《仓颉篇》这类书编的《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除《急就篇》外，亦皆失传。《急就篇》所收，全是当时常见习用的字。开头的几句是：“急就奇觚与众不同，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这些是为学童识字而编的速成常用字课本。由此可见上面列出的书名也都是类似的启蒙读本。它们是对文字进行研究整理工作的基本环节，处于形成字书的萌芽阶段，这和真正的字书还有很大的距离。

《仓颉》类的读本经文人儒生的注释、或释义、或分析字形，终使这些书超出识字课本的范畴，初步具有字典的作用。它们都为《说文解字》的成书提供了必要的借鉴和条件。《说文解字》的训释所引资料可以看出许慎充分汲取前人的成果，在收字、解形、释义上有继承又有发展的线索。例如：

《说文·手部》：“𢇛，首至地也。从手𢇛，𢇛音忽。拜，杨雄说拜从两手下。”

《说文·晶部》：“𠄎，杨雄说以为古理官决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从晶从宜。亡新以为𠄎从三日太盛，改为三田”。

上面两例是许慎引杨雄《训纂篇》解说字形释义的例证，《训纂篇》比《说文解字》早一个世纪，许慎在征引时或直取或别引一说供参考。又如：

《说文·女部》：“𡈼，女师也。从女加声。杜林说，加教于女也，读若阿”。

《说文·耳部》：“耿，耳箸颊也，从耳𦍋省声。杜林说耿光也，从光圣省声。凡字皆左形右声杜林非也”。

上面两例是许慎引杜林《仓颉训诂》解形释义，并有所校正的例证。

从杨雄《训纂篇》和杜林《仓颉训诂》，可以看出前代字书在解形释义乃至编排方面都为《说文解字》的产生作了充分准备。为体例完善的《说文解字》的成书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